

第一章 緒論

滿洲國唷 蒙古唷 / 中華民國唷 泰國唷/法屬印度尼西亞唷 日本唷/全亞洲的
民族唷/啊~~偉大的亞洲唷/團結吧(一)

我們一起喜悅/我們一起悲傷/我們一起痛苦/我們一起興盛/啊~~~勇敢的亞洲唷/
進軍吧(二)

在天空閃耀的太陽唷/舉國高漲的熱情唷/我們祖先的天空唷/我們子孫的土地唷/
啊~~~美麗的亞洲唷/團結吧(三)

我們現在緊握雙手/我們堅定的立誓/迎向那個共同的敵人/打造共同的樂土/啊
~~~神聖的亞洲唷/進軍吧(四)

--〈興亞大進行曲〉<sup>1</sup>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代以來東亞的幾次戰爭皆影響深遠，從較早期的甲午戰爭(1894)至中日戰爭(1937)再至「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1941)，<sup>2</sup>皆牽動東亞國家的發展進程。位在東亞的各國，包括中國、朝鮮及台灣在這段共同歷史語境下如何表述？就在日本掀起大東亞共榮圈建造意圖之際，是否也形塑了一段「共同經驗」<sup>3</sup>，這段歷史經驗中的文化表述以及所擁有的共同文學史經驗引起筆者的注意，因而想進一步探究，在大東亞共榮圈視野下的這些東亞經驗、記憶、文化與歷史的交錯問題，並試圖以宏觀的角度來檢視戰爭的肇始者--日本與亞洲各國的關係，省思「戰爭期」這段脫序的東亞新秩序建構，及其對亞洲造成的衝擊。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念茲在茲的「文明化」、「脫亞入歐」思想，<sup>4</sup>到了昭和時期一轉而想要「近代超克」，不僅要與西方列強並駕齊驅，甚至於要超越西方，創建亞洲獨特的霸權國家，其契機為何？順著這個思潮而起，「近代超克」說也成爲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戰爭論的主要意識型態，並逐漸在日本社會蔚爲風氣，此視野也成爲「大東亞共榮圈」

<sup>1</sup> 藏原伸二郎〈興亞大進行曲〉，《興亞詩集》，大政翼贊會宣傳部，1941年12月。

<sup>2</sup> 所謂「大東亞戰爭」是日本於1941對美宣戰後使用的名稱，戰後在美國主導下一律改稱爲「太平洋戰爭」，本論文延引戰時名稱，使用「大東亞戰爭」，以後各章皆同。

<sup>3</sup> 見申正浩〈二十世紀前半期東亞文學殖民性比較研究—日本內地、台灣、滿洲國、朝鮮、中國大陸比較研究〉，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1月19-20日。

<sup>4</sup> 即福澤諭吉提出的「脫亞論」，參見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東京：岩波書店，1962年11月出版。

的建造基調，可視為日本發動戰爭的思想源起。<sup>5</sup>首先，值得我們思考的議題是，日本在提出「近代超克」的概念同時，已經假設了一個假想敵—歐美，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提起其實也可視為其對西方殖民霸權的反動，這種反動思潮刺激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發展，也因此成為戰爭的引爆點。日本意識到自身力量不足以對抗歐美，因而有了動員亞洲的思維，然而，相較起西方的歐美，東方的亞洲各國長期以來屈於弱勢，南洋各地更成為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日本作為亞洲第一個成功西化的國家，對於西方產生了更多的顧慮與防備，也因此萌發了大東亞建造的思維，想試圖一舉凝聚對抗西方的新勢力，然而，遺憾的是作為對歐美的反動而起的興亞計畫，最後終於跟西方列強一樣走向侵略的帝國主義。<sup>6</sup>作為第一個擁有殖民地的亞洲國家而言，日本在殖民地透過政治、教育、經濟等企圖馴化當地的過程，對台灣與朝鮮皆展現了極強的滲透力，即便是現今，透過當下的後殖民語境來審視，其所殘留的殖民圖像與記憶依然具有相當的感染力。日治時期日本當局在殖民地推行的皇民教育塑造了「皇國子民」的共同印記，並期待藉由此來推動日本國族神話，以殖民地的奧援作為動員的基礎前進大東亞。日本在發動對中戰爭後，執力拓展興亞運動，緊接著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又鼓吹大東亞，從興亞運動到大東亞共榮的過程中，可以窺見日本對亞洲經營概念上的轉變，而此轉變也牽動亞洲的發展。<sup>7</sup>

本論文想以 1937 年至 1945 年「中日戰爭」、「大東亞戰爭」時期為座標，進行「跨界」的文學與文藝體制之考察研究，探討關於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之建構概念及其欲型塑的東亞文學觀，與大東亞圈各地域對於此文學建構所衍伸出的知識、權力、文化關係的接受與質變。

### 一、「大東亞共榮」的再思考

「大東亞共榮」的建構概念提出了一個有趣的空間座標的架構，意即，

<sup>5</sup> 所謂「近代的超克」之議題，在日本有兩次討論高峰，一是大東亞戰爭時期的日本右翼為了翼贊國家而提倡「近代の超克」論，旨在連結戰爭與法西斯主義的邏輯思想，另一次則是戰後，竹內好於 1948 年提出「近代の超克」，竹內好由戰後日本的失敗反思了日本在近代化的過程中對歐美的近代超克的思想之誤謬，甚至重新審思日本之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與民族主義，從而提出此三者之間有區分的可能性，如此一來才能從根本來克服日本之軍國主義，基本上是對日本戰前近代超克論提出反思與批判。見《竹內好全集》第八卷〈近代の超克〉、〈日本とアジア〉、〈日本のアジア主義〉，東京：筑摩書房，1980 年 10 月，頁 3-156。

<sup>6</sup> 參見林慶元·楊齊福著《「大東亞共榮圈」源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 11 月初版。

<sup>7</sup> 大東亞共榮圈的含括範圍參見本論文「附錄三」。

此建構提供我們跳脫單向的、線性的歷史時間的亞洲史之思考方式，向歷史橫向的空間架構來探索。在「跨界」的空間中討論「戰爭期」間「大東亞文學圈」與日本帝國之間關於「人」、「知識」與「文學史」之間的交錯與衍譯。日本於 1943 年 11 月 5、6 日在東京舉辦了「大東亞會議」，號稱此為畫世界史的創舉，日本國、中華民國（汪兆銘）、滿洲國、泰國、菲律賓、緬甸並共同擬訂了五大共同目標原則，「大東亞宣言」為：

世界各國應相倚相扶，共享萬邦共榮之樂，以確立世界和平為根本要義。然英美為求自國之繁榮而壓抑他國、他民族，對大東亞不斷的進行侵略壓榨，逞其稱霸大東亞之野心，更顛覆了大東亞安定之基礎，此為大東亞戰爭之原因。

大東亞各國應互相提攜，完成大東亞戰爭，從美英桎梏之下解放大東亞，以求自存自衛。根據左邊之綱領，以建設大東亞，期待寄望確立世界和平。

⊙、大東亞各國相互協同，確保大東亞安定，本著道義，建設共存共榮之秩序。

⊙、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彼此之自主獨立，呈現睦鄰之成果，確立大東亞之和睦。

⊙、大東亞各國相互尊重各自之傳統，伸揚各民族之創造性，發揚大東亞文化。

⊙、大東亞各國在互惠之下緊密提攜，促進經濟發展，增進大東亞繁榮。

⊙、大東亞各國和世界萬邦誠意往來，撤廢人種差別，普及文化交流，開放資源，期對世界進步有貢獻。<sup>8</sup>

此「大東亞宣言」中提出的「統和」觀提供我們反思的可能，其所呼籲的東亞各民族之統合、團結之強調，提供了討論的空間。自從明治維新後，日本步上近代國家的腳步，以亞洲的第一個現代國家自居，在此種亞洲第一的思維下，國家的視野一度轉向脫亞，意即擺脫落後的亞洲桎梏，進入西洋之林。然而在與西洋的多重利益衝突之下，有了「興亞」思想的萌發，以岡倉天心為主的「東洋論」提出的「亞洲人的亞洲」與福澤諭吉的「脫亞論」主宰了日本的近代思潮，緊接之後的「大亞細亞主義」繼承了岡倉天心的思想，欲立足在亞洲自立的觀點，以亞洲自決的方式來興盛亞洲。<sup>9</sup>因此其於「大東

<sup>8</sup> 《朝日新聞》（夕刊），1943 年 11 月 6 日。

<sup>9</sup> 參見松本健一《近代アジア精神史の試み》，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 年 12 月初版

亞宣言」中強調的東亞民族團結之訴求，實際上繼承了其長久以來的亞洲思維，從「大亞細亞主義」擴大而成「大東亞」的視點。此處，必須注意的是，此強調東亞一體的亞洲自決論述，其背後實際上是「大日本主義」的操作。「大東亞」構想中所強調的東亞團結，是當時的亞洲可以抗衡西洋歐美列強入侵力量的最佳策略。在科技文明都落後西洋的亞洲世界，唯有團結一途，可以修正與歐美勢力上的傾斜狀態。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也意識到了此點，因而呼籲，恢復亞洲的榮光必須藉由全亞洲的力量，<sup>10</sup>大亞細亞主義的提倡也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衍生，也就是，大亞細亞的觀念不是日本獨有，其可視為亞洲一個共有的意識形態，是處於那個時代思考歐美列強問題所形成的共同思維，實際上有其可行性。然而，日本的悖論在於，其以大東亞來號召亞洲的團結融合之目的，實際上是複製了歐美的帝國主義思考模式，它的東亞設想具有明顯的位階順序，可以說是以日本為盟主地位的東亞思考，僅是將歐美列強置換為日本帝國，延伸其勢力範圍的作法。也因此今日我們提及「大東亞共榮圈」的思想之際，直接的會朝向負面的、侵略的、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思考。對於「大東亞」的共榮思維，筆者認為除了意識形態的認識外，更應該試著從此概念來檢視亞洲的「共時」議題，意即透過「大東亞」的概念，亞洲的日本、中國、台灣、韓國、滿洲國各以何種視野來觀看、呼應，在抵拒與接受之間的轉折變化又是如何展現，置放於當時的歷史語境上，則「東亞共榮圈」的議題便具有時代性的意義，也就是，此種提出提供了各界的何種想像？將戰爭期視為一個東亞共同的歷史範疇，以及共同的經驗進行「橫向」的歷史檢視，筆者認為可以與線性的歷史思考之研究成果互為參照，以呈顯出不同的面向。

其次，政治上的大東亞共榮圈之提出所引發的關於思想、文化層面的交流也引起筆者的注意。Anderson在《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中，以東南亞民族為對象進行「共同體」的形成分析，包括知識人如何介入殖民主與殖民地間而衍發的「殖民地民族主義」的問題，以及「雙語精英」在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扮演的角色，皆可成為探討作為日本殖民地的韓國與台灣知識份子的最佳借鏡。<sup>11</sup>特別是戰爭期間，從「國民總動員令」頒布開始，身為日本一環的殖民地民眾即被以「國民」的身分參與動員，

---

<sup>10</sup> 參見孫文〈大亞細亞主義〉，收於黃彥編《孫文選集》（下冊），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初版，頁619-629。此為孫文於1924年11月28日在神戶高等女學校之演講稿。

<sup>11</sup> 參見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文化出版，1999年4月初版。

也就是政治上的翼贊號召，提供了殖民地文化活動的伸展契機，特別在「大政翼贊會」的文化部成立之後，身為「總力戰」組成一部份的殖民地文化工作，有了兩面性的發展，一面呼應了政策所需，一面卻也提供長期以來在「同化政策」中被排除在外的地方文化之存續機會。特別是大東亞宣言中提出的「一視同仁」、「民族共存」之口號，也使得「大東亞共榮圈」的思維在殖民地中發酵，在無法預期的戰局下，殖民地知識人在共榮圈中窺見何種可能性，並且以何種心態參與，值得深入的探討。此外，中國的日本勢力範圍下的華中、華北以及滿洲國各地在「大東亞共榮圈」口號下各自展現如何的協力方式，與日本的互動又是如何展開？其中作為支撐「大東亞」文化運動中心的文化人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也是考察此議題重要的動向。意即藉由研究「大東亞文學圈」的文學、文化「跨界」之流動所呈現之東亞圖像，提供了一種有別於現階段研究的「新」方向。

筆者在閱讀台灣文學研究論文之際，有感於台灣研究的侷限性，也就是被台灣主觀所壟罩。因而在思考「大東亞」之議題時，特別期待能夠有「跨台灣」的勇氣與觀點，也就是不拘泥於台灣觀點，而是透過整體的亞洲歷史進程來觀看此「共同體」之脈絡與發展。日本的帝國主義固然要加以批判，然而，戰爭期的「大東亞共榮」建構，也提供了一個可以照看亞洲的方法與思維，透過日本的「大東亞」圖像之建構，能相對的以宏觀的視野、比較的觀點，討論亞洲歷史的共時性的可能。近幾年來，以當代的東亞視野來探討關於「東亞文學」的建構漸成爲熱潮，有鑑於此，本論文期待從戰爭期的日本之「東亞」建構著手，思考帝國主義、殖民思維、文化主體、文學想像等交錯的近代亞洲的東亞思維與邏輯建構。

## 二、大東亞文學與皇民文學

戰爭期間的文學創作依照地域差異而有了不同的稱謂，在界定大東亞文學與皇民文學的定義時，此文學的概念與範圍也必須加以釐清，特別是進入大東亞戰爭之後，究竟是要以「大東亞文學」爲名？抑或是「皇民文學」爲名？呈現混淆的錯亂感，因而有加以界定之必要。無庸置疑的，此兩種文學的起源與政治有著極爲密切的關係，並且是在日本的帝國主義思潮下的產物，然而，將其置於戰爭歷史中以及大東亞共榮圈的建構中來審視，則透過這類的文學觀察爬梳的過程，其所呈顯出的意義則是更爲多元而複雜。至目前爲止，沒有對於這些文學與歷史進行細部分析的研究，因而筆者認爲有進行研究的必要。此大東亞文學的名稱是因應「大東亞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稱呼，在大會上，大東亞文學的建立與推動成爲文化建設政策的一環。所謂的「大東亞文學」具有廣泛的含括意涵，意即，在大東亞共榮圈中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即可謂之。可以說，大東亞文學的組成，實際

上包含了共榮圈中的各個組成領域，以日本文學報國組織擔任主要指導工作，大東亞文學作品的主要訴求為必須是符合東亞、興亞精神之作，例如增產文學、報導文學、戰爭文學、親善文學、皇民文學皆在此範圍內，此界定是從文學性質來區分，其有效範圍較為寬廣。相對而言，皇民文學的面向則較為窄化，主要以殖民地的文學作品為對象，包括了韓國與台灣產生的具有「皇國精神」之作。皇民文學的定義是嚴格的，台灣的內地作家神川清在討論此議題時說道：

我想呼籲的是，在皇國體制的自覺中找到文學的開端，貫徹皇國體制，藉此將作品與國體結合的態度之必要性。（中略）在此決戰態勢之下，我等思想決戰陣營的戰士，必須撲滅非皇民文學，並揚棄非決戰文學不可。再容我借點時間說一句話，可稱之為大東亞文學的作品的性格，其根本意義可說是高度的思想性。只是把文字組合起來，或只是描寫事物的文章，沒有資格稱得上是具有生命的文章。唯有透徹明白皇國體制，內容滿溢建設之喜悅的作品，才可以稱得上是最健康的作品。<sup>12</sup>

在殖民地產生的皇民文學可視為最凝練的大東亞文學之作，亦是大東亞文學中的典範。實際上，大東亞文學的範疇是一種更為開放的概念，不僅能容納純國粹精神的皇民文學，甚至於廣泛的東亞地域之創作，如前所述的範圍內文學全屬之。從這個簡單的範圍界定中，可以解釋戰爭期的殖民地文壇為何既有大東亞文學的呼聲，又有皇民文學的提倡，這兩種文學是相互包容的概念，也就是說，大範圍的大東亞文學實際上涵蓋了皇民文學作品，而皇民文學作品也可上綱成為大東亞文學的一個組成。然而，皇民文學提供了觀看殖民地戰爭文壇的一個切口，也就是大東亞文學建構的進程，一方面具有「共時性」，一方面卻又各有獨立性，此「大東亞文學」意涵的豐富性可由這些同時開展的文學論述與創作中窺見。此種多元的文學發展現象，提供筆者考察此「大東亞文學圈」一個重要的視野，並期待透過這些糾葛的文藝活動的討論，釐清東亞戰爭時期的文藝現象。與大東亞文學確立最為相關的是三回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之舉辦。1942年11月召開了第一次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出席的代表包含了：日、滿、蒙、華及殖民地朝鮮、台灣代表，共152名，<sup>13</sup>針對大東亞文學之概念與落實進行交流討論。《日本學藝新聞》以〈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意義〉為題，提出對東亞文藝的看法：

<sup>12</sup> 神川清《台灣公論》9：1，1944年1月，邱香凝譯，譯文收入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第4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10月初版，頁426。

<sup>13</sup> 參見《日本學藝新聞》142號，1942年11月1日。

東亞總和體的文藝，事實上將會在今天以後誕生。日本文化、支那文化、印度文化，以及其他東亞各地的文化，會在各自不同的地域，各自發展，這些可以稱之為東亞，或者東洋。這些文化與西洋的文化對比，日益發達，事實上就是今後的新文化。老實說，我們對於在我們身邊具有地方色彩的文藝實在太過等閒視之，特別對滿洲文學、台灣文學、朝鮮文學，我深深感覺如此，應當重視這些地方所產生的優秀文學。現今的日本認為這些地方不會產生值得一看的優秀文學，這種態度是無可原諒的，日本在今後應當借助這些地方的文藝，把它當成後援，必須將日本文化好的地方與地方之優點混合起來。<sup>14</sup>

「大東亞文學」的概念是一種融合的觀點，這種混融的「八紘一字」的文學觀究竟能夠在統合大東亞文學論述中起到多大效果，是筆者對於此論述的動機所在。第二回的文學者大會於 1943 年 8 月 25 日以「大東亞文學者決戰會議」名義舉辦，與會的文學者共 125 名，此回的召開是爲了探討決戰態勢下的文學翼贊，及文學者們的文學報國之法。第三回的文學者大會以「南京大會」於 1944 年 11 月 12 日在南京召開，共有 68 名文學者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直接影響了各地的文藝政策，此外他還以各種機制來統合共榮圈，包括了互派文學者、座談會、演講會等等的組織化活動，對於推動「大東亞文學」有一定的建樹。本論文期待從大東亞文學的範疇中，細部分看各地域的文學現象，透過多層的文學發展來檢視日本的帝國想像，並從文學史的角度來分析「大東亞文學」、「皇民文學」這類文學作品在「戰爭期」所揭示的歷史語境中所呈顯的意涵，特別是在現階段的思想史方面已有多位台、日研究者針對東亞儒學之間的共通性進行研究與討論，尋求東亞「知識共同體」的可能性，此研究也刺激筆者對於戰爭期間可能形成的「文藝共同體」的空間建構產生反思，期待能夠對戰爭時期的「文藝空間」有更多的挖掘與發現。

##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目的

「大東亞文學」的有效範圍遍及亞洲，同時還涉及了殖民主義與戰爭事件，特別是從「戰爭」引發的「斷裂」的議題，<sup>15</sup>以及透過此戰爭所型塑

---

<sup>14</sup>見一戶務〈大東亞文學者大會の意義〉，同前註。（原文爲日文，筆者自譯，本論文在日文的原文使用方面，已有譯文者採用翻譯文章，未有譯文者由筆者自譯，以下不再另作註明。）

<sup>15</sup>如身爲殖民地的台灣、朝鮮，在總動員令之下全都必須服膺於政策，特別是「皇民化」運動之後，屬於自身的本國固有的文化傳承被截斷，一轉而必須以「皇國」文化爲最終信仰，另外，在中國、滿洲國方面，也受到日本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之影響，對於語言、思維、知識架構的建立也都有別於原本的文化系統，在此情況下，文化

出的特殊的空間語言與文化現象，都是處理此議題之際必須納入的研究視野，「大東亞文學」的口號是由日本在戰爭期間（大東亞戰爭）所提出，然而其透過各種機制、政策在各地的推動效果為何？迄今仍未獲得全面的解答，「大東亞文學」從口號到落實推動過程中，關係著此時期亞洲文學發展的樣貌，透過此議題的梳理也能窺見戰爭時期各地域的「亞洲觀」之呈現。由於研究課題的龐雜所致，本論文欲從戰爭時期的文藝著作、文學活動、文學者的空間流動以及戰事發展態勢等多重觀察來進行此項研究，筆者期待從層層的分析過程解決關於此「帝國」與「共榮」的想像與建構，並從而呈現此歷史場域中的「共時」發展，也就是透過對殖民地、占領區、傀儡政權的個別分析，來檢視此一「文學史」歷史進程的全貌。<sup>16</sup>

### 一、 研究方法：文本與歷史的多重考察

「中日戰爭」、「大東亞戰爭」既是歷史紀錄，也是文學史中無法忽略的重要發展進程，更是特定時期的社會思潮之呈現。透過對於這些片段的重組、挖掘與分析，本論文期待能夠恢復戰爭期的歷史語境，並從此歷史脈絡進入與文本的聯繫，更希望透過文藝活動與歷史的多重觀察，從中整理出戰爭期的氛圍與時代意涵。從對歷史語境的爬梳過程中，透過戰爭策略、口號、媒體、報刊與那些周遊於大東亞的知識份子們所構成的豐富圖像的複雜互動、聯繫重新解讀「大東亞」。除了法西斯軍國主義的大東亞印象外，究竟此「大東亞」所尋求的「共同」的意涵為何？期待解決什麼課題？面對深入東亞的歐美霸權，大東亞又欲提供何種對抗方式，是日本單方面的帝國想像，亦或是，同處於亞洲的各地域想尋求解決的之道的選擇？意即，大東亞的建構為亞洲帶來何種希望與想像？為了尋求對這個歷史片段的全面概括，本論文想從大東亞的各連結一一探究，透過日本內地、殖民地台灣、朝鮮、占領區華北、華中以及滿洲國的文藝活動、政策與作家、作品來審視「大東亞」。

本論文擬從文藝活動、政治運動、社會思潮、文化人互動與流動等多項考察中研究「大東亞文學圈」。從各地的「大東亞文學觀」的架構與目的之論述過程來檢視此時期的「大東亞」知識論系統的傳遞與建構，並嘗試從日本之眼、台灣之眼、朝鮮之眼、中國之眼、滿洲國之眼等東亞觀點的交互

---

「斷裂」、「混融」情形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其型塑出之圖像值得進一步探討與分析。

<sup>16</sup> 本文為了呈現當時日本的共榮圈視野，因此沿用此時期的稱謂，不使用現代稱謂，如韓國，本文以朝鮮來敘述，東北地方以滿洲國為敘述，此外地名也援用當時期的名稱，如北平以北京來稱謂、長春以新京為名、瀋陽以奉天為名等。



考察，以呈顯出一個較為完整的「大東亞」圖像，及較為「合理」的大東亞文學之解釋。以文學場域的觀察作為出發點，加上社會、政治、文化脈絡的輔佐，藉以呈現「戰爭期」的各層互為影響的複雜之糾葛。本研究概括歷史與文本研究兩個研究面向，歷史方面的考察以 1937 年至 1945 年此 8 年的戰爭期之「空間」的「橫向」建構為主要分析視野，並輔以各機關之政策推行，討論政治層面的東亞建構意涵，如「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大政翼贊會」、「文學報國會」、「斯文會」、「國語協會」、「興亞院」、「大東亞省」、「皇民奉公會」、「滿洲帝國協和會」、「弘報處」、「滿洲文藝家協會」等以日本為中心的政策推動機構的成立，以及各地域在「國族」、「民族」論述中的「東亞圖像」之展現，在日本提倡的以「國體精神」為主要建設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現場中，所有「在場」的國家、地域的翼贊動機之探索，與日本提出的「八紘一宇」與「國體精神」之間的歷史悖論都是此歷史考察的重要目的。此外文學史與理論相關學科的應用，也是此論文的研究方法之一，特別是「大東亞文學」中的「文學史重疊」現象，也是此研究的重要概念，原本各成系統的文學史之發展，在此「戰爭」的契機下開始了交錯的展開，文學史脈絡的釐清有助於各地域文學史的還元，同時也提供文學史書寫中對於此段「戰爭歷史」下的文學創作一個更客觀的評價空間，跳脫「大日本帝國」的意識形態之批判書寫，試著從歷史中來觀看文學、作家與時代互動產生的意義。此外，薩依德的「東方主義」、「文化與帝國主義」中的關於「霸權」、「知識建構」、「文化展現」等後殖民觀點也提供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切入視野，有助於考察過程中思辯的分析。

除了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外，此時期的文學創作、報紙紀錄、雜文是此時期的重要文本。透過對於「大東亞文學圈」各地文藝創作與雜文的分析有助於填補歷史研究的不足，透過文本的研究可以更深入理解知識人與文化霸權之間的介入與影響，及其所構成的社會氛圍，與此時期的文學觀，唯此時期的參照「文本」數量龐雜，因而筆者將撿擇活躍於東亞文學圈中的文學者與其作品與相關活動作為研究對象，以文本與歷史交互參考的方法進行論文之討論工作。

## 二、 研究目的

有鑑於「大東亞文學」的研究領域至今仍未有一明確的梳理，尚待釐清與探究，因此本論文期待透過對此領域的爬梳，將其中所含涉的複雜性、多元性一一指出，並試圖找出一些脈絡，系聯此龐雜的建構體系。自目前為止，對於此時期的研究多是以地域性文學或歷史建構為主，沒有一個綜合觀看的比較成果，其討論中所展現的大東亞視野，也因此有其片面的侷限性。關於日本企圖建設的「亞洲新秩序」有其思想的淵源，子安宣邦在論及「『世

界史』與亞洲、日本」的議題時，指出：

「作為方法的亞洲」這一視角，則是從編入歐洲化的「世界秩序」或者「世界史」的過程來觀察日本近代的發端。<sup>17</sup>

子安宣邦揭示了日本在進入近代化國家後，念茲在茲的世界秩序的組成，也就是日本是將自己置放入歐美西洋的世界史的構想來建設國家，而透過此思維的發展，亞洲成爲其企圖進入世界的籌碼，亞洲各國也在此種思維成爲大日本帝國的拓展史中不可或缺的一員，這種由「文明化」而來的國家思維，是建構此大東亞的重要關鍵，日本的「文明」、「野蠻」的亞洲秩序的界定，以及世界史中「西洋」與「東洋」的秩序都主宰了近代歷史的發展，也是「大東亞」建設中不可忽視的背景，本論文期待借助於思想史的分析完成對共榮思想建構以及大東亞文學圈的討論。

本論文除了檢討日本的世界秩序之思考外，並且，還期待透過殖民地的文化建構、知識體系等方面的考察、分析，與殖民母國相互參照，希望藉此呈現多元的面向。日本的「文明論」思考同時也主宰了殖民地的統治思維。透過語言、教育等同化政策在殖民地型塑出的「文明觀」，深刻的影響了知識階層，特別是日語世代的殖民地知識份子。「文明觀」的注入，以及「國語」的運用都在殖民地內產生了知識系統的質變，日本知識系統的引進穩定化過程中，與殖民地的原有文化系統形成了混合知識體系，此建構引起知識階層自身的矛盾情緒，也就是殖民「內化」的議題。戰爭期之前的「同化政策」相對而言較爲鬆散，目的不在於「皇民」的養成，也就是刻意製造出「內地」與「殖民地」的位階，然而，「戰爭」期的來臨，統治當局在企圖純化「大和精神」的注入過程中，使得這些衝突全都顯露，特別是殖民地的文學者們對於「鄉土愛」與「國家愛」之間的探詢，都顯示了殖民地知識份子從「文明論」介入之後，隨著殖民體制穩定狀態下日益深刻的擺盪與動搖。本論文期待從「大東亞文學圈」的視角來觀察殖民地文學的東亞思維與位置，特別是作爲日本一環的翼贊角色，殖民地所展現出的東亞文學之考量有其特殊之意義，所謂的「皇民作家」之定義及思維模式也是本論文中欲探討的範疇，特別是日本這個亞洲唯一的殖民國，在其殖民地建設過程的設想中有著與歐美不同的殖民思維與形式，透過移民的鼓勵，殖民地內和日、台/日、朝的雜處經驗也影響了「東亞」論述。日本於戰爭時期的精神狀態，以及其企圖在亞洲興建的「大日本帝國」中，灌輸於亞洲的「皇國思想」、「國體

---

<sup>17</sup>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4月初版。

明徵」等「大和精神」之建設運動中，究竟在「大東亞文學圈」中起了何種效果與影響，另外，透過日本的東亞圖像之建構提供知識份子、文學者們何種想像？皆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目的，期待能以此成果提供對於大東亞文學研究的一個面向並引發其他思考的可能。

### 第三節 文獻資料與章節安排

有關大東亞文學的參考文獻資料相當豐富，筆者在進行論文的過程中，擬以日本出版的戰時刊物，如雜誌、報紙、機關誌、外交檔案等文獻以及復刻的文學作品與殖民地所出版的總督府公文日誌、文學刊物、文化人之日記、報紙，以及滿洲國的文學作品復刻、上海、華北的文學刊物等文獻史料作為此論述的基礎。

#### (一)、日本方面：

- 1、報紙部分有：《大阪每日新聞》(台灣版)、《大阪每日新聞》(朝鮮版)《大阪每日新聞》(滿洲版)、《東京朝日新聞》
- 2、旬刊、雜誌部分有：《國民精神總動員》(國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從1940年9月開始改名《精動》)、《文學案內》(文學案內社)、《文學報國》(日本文學報國會)、《中央公論》(中央公論社)、《東亞文化圈》(青年文化協會東亞文化圈社)、《東亞聯盟》(東亞聯盟協會)、《週報》(情報局)、《日本學藝新聞》(日本學藝新聞社)、《新潮》
- 3、史料文書：《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1840-1945》(外務省編)、《資料集 總力戰と文化第1卷》(大月書店)、《文學年鑑》

#### (二)、台灣方面：

- 1、報紙部分有：《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日日新報社)、《台灣新民報》(台灣民報社)、《台灣新報》(台灣新報社)、《台南新報》(1937年4月以後改名台灣日報)、《興南新聞》(興南新聞社)
- 2、旬刊、雜誌、宣傳集部分有：《大東亞戦争と台湾》(台灣總督官房情報課)、《文藝台灣》(台灣文藝家協會)、《台灣文學》(啓文社)、《台灣公論》(台灣公論社)、《台灣文藝》(台灣文學奉公會)、《台灣時報》(台灣總督府情報課)、《台灣藝術》(台灣藝術社)、《台大文學》(台大文學會)、《民俗台灣》(東都書籍台北分店)、《旬刊台新》(台灣新報社)、《新建設》(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
- 3、史料文書有：《台灣日誌》、《台灣年鑑》

4、日記、回憶錄有：《林獻堂日記》、《呂赫若日記》、《吳新榮日記》、《葉榮鐘日記》、《陳逸松回憶錄》

(三)、朝鮮方面：

報紙、雜誌方面有：《朝鮮日報》、《東亞日報》、《京城彙報》、《京城日報》、《朝鮮》、《國民總力》、《文教の朝鮮》、《東洋之光》、

(四)、北京、上海方面：

報紙、雜誌方面有：《中國文藝》(中國文藝社)、《中國文學》、《文友》、《華文「大阪每日」》、《中國公論》、《申報》、《新申報》、《大陸新報》、《中華日報》、《國民新聞》、《萬象》、《新地》、《文運》、《新流》、《華聯》、《益友》、《文匯報》

(五)、滿洲國方面：

1、報紙、雜誌方面有：《滿洲日日新聞》、《滿洲評論》、《滿洲浪漫》、《北窗》、《盛京時報》(中文)、《明明》(中文)、《藝文志》(中文)、《藝文》

2、史料：《滿洲文藝年鑑》、《滿洲國現勢》、《滿洲國文教年鑑》

除了上述的當時代出版的報紙、雜誌之外，日本方面已有相當數量的殖民地文學作品的復刻，以及滿洲文學作品的復刻，另外，台灣方面也有殖民地時期的相關文學作品與作家全集的出版，中國方面也有「東北現代文學大系」、「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的出版，都是本論文中得以參考之作。

此外，除了這些文獻資料的出版可資利用外，台灣方面的碩、博士論文中關於作家個人的研究以及「皇民化時期」的論述也提供筆者可資參考之視野。其中，施淑的〈「大東亞文學」在「滿洲國」〉是台灣的研究者首度處理關於「大東亞文學」的議題，施淑以「滿洲國」的文藝活動與滿洲文藝發展作為主要論述的脈絡，對於滿洲的政治、文藝有詳盡的探討，是本論文在觀察滿洲國文藝發展過程的重要的參考。<sup>18</sup>另外，柳書琴的碩士論文《戰爭與文壇—日據末期台灣的文學活動(1937.7-1945.8)》中巨細靡遺的處理了戰爭時期台灣文壇的碰壁狀況，以及文學雜誌--《文藝台灣》、《台灣文學》中，日、台作家的處境與動員對應，提供了戰爭時期台灣文壇的概況，是以歷史處理文藝的佳作。另外，在中國學者的研究方面，張泉的《抗戰時

<sup>18</sup> 參見施淑〈「大東亞文學」在「滿洲國」〉，收入《文學、文化與世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出版，頁589-631。

期的華北文學》試圖從客觀的層面對「淪陷期」華北文壇的文學社團、文人活動有相當仔細的爬梳，提供了戰爭期華北文壇的整體脈絡的掌握。<sup>19</sup>王向遠則從「民族」視野討論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化侵略議題，著作有：《「筆部隊」和侵華戰爭—對日本侵華文學的研究與批判》（北京：崑崙出版社）、《日本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學者、文化人的侵華戰爭》（北京：崑崙出版社）、《日本右翼言論批判--「皇國史觀」與免罪情結的病理剖析》（北京：崑崙出版社）。此外，日本方面，目前已有從各角度分析「東亞共榮圈」的著作，如川村湊從民俗學、文學、國語政策等觀點討論大東亞，出版了：「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實》（東京：講談社）、文学から見る「満洲」--「五族協和」の夢と現実》，（東京：吉川弘文館）、《生まれたらそこがふるさと--在日朝鮮人文学論》、《作文のなかの大日本帝国》，（東京：岩波書店）、《海を渡った日本語--殖民地の「国語」の時間》，（東京：青土社）、《滿洲崩壊--「大東亜文学」と作家たち》，（東京：文藝春秋），此外，櫻本富雄從徵用作家的觀點寫了《文化人たち大東亞戦争—PK部隊が行く》，（東京：青木書店），同時也出版《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亜戦争下の文学者たち》，（東京：青木書店），探討了文學報國會與文學者的關係，其中詳盡的說明文學報國會的職責與任務與崩壞，並討論三回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本末，極為詳實。其中與本論文關係較為密切的是池田浩士編的《大東亜共榮圈の文化建設》，（京都：人文書院），本書討論了「何謂文化建設？」、「新加坡的皇民化教育的真相」、「花木蘭的轉生—圍繞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日中大眾文化的交錯」、「稻米也成爲大和民族—水稻品種的「共榮圈」」、「葬法的文明論—殖民地朝鮮的土葬火葬」、「大東亞共榮圈文化」的擔任者們」，其中第一部分與最後部分論述的文化相關建設與本文較有關聯，雖然細膩的處理了文化建設的議題，然而，並未討論關於文學的議題。

上述的論文中，對於「大東亞文學」的概念都是粗略性的提及，並未有專門的立論，對於文本的分析也付之闕如，因而本論文在這些前行研究之下，期待能夠初步整理出大東亞文學圈的輪廓，以完整的呈現出此文學圈大致的互動與系譜，討論「帝國想像」的烏托邦神話之建構與文化文藝之間的糾葛。

基於以上的研究視野與關懷，本論文中一共處理了五個個案，主要是以日本的帝國主義發展脈絡爲東亞文學圈的論述中心，並以此討論大東亞共榮

<sup>19</sup> 參見張泉《抗戰時期的華北文學》，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初版。本書是根據氏著《淪陷時期北京文學八年》，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4年10月初版，加以增補改訂而成。

圈下的五個漢字使用地域，其中包括日本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台灣與朝鮮、以及透過傀儡政權操縱的滿洲國及中國，我在中國的部分以華北（北京、天津）、華中（上海、南京）為主要討論對象，試圖透過這些個案之討論剖析東亞地區在大東亞想像下的文學樣貌並以此討論日本文學共榮的表象與實相。各章中的撰寫要旨於前言中有詳述，在每章的最後有「小結」，總結各章的論述，筆者期待透過此「橫向」的大東亞文學圈的討論，可以有效的總括此時期各地域的文藝活動、創作與政策之間的接受與影響，並且進一步對於台灣的東亞文學研究有所助益，以文學史、亞洲史的角度重新審視此時期的「共時」文學圖像。

